

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

卜师霞 著

中华书局

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

卜师霞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卜师霞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12

ISBN 978-7-101-13596-1

I.源… II.卜… III.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 IV.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1576 号

-
- 书 名 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
著 者 卜师霞
责任编辑 周毅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7¼ 插页 2 字数 178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596-1
定 价 52.00 元
-

本书出版得到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经费资助

序

王 宁

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以传统训诂学为出发点,探讨汉语词汇语义的存在与发展特点。最先展开讨论的是双音合成造词的问题。汉语词汇的发展经过原生造词、孳生造词和合成造词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在传统训诂学里都已经涉及,而且有了很多比较成熟的结论;而合成造词阶段的一些研究,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拘泥在“词汇化”和“形式构词法”的路子里,离汉语的事实渐渐疏远。我们的思路沿着汉语的事实往前走,有两个方法问题在研究中形成定论:第一个,要转变一个角度,不止从形式上去描写构词的模式,而改从形式与意义并重、以意义为主的角度来观察双音构词。第二个,是改变绝对“共时”的描写原则,训诂学提供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汉语的本源双音词,古今沟通是必由之路,把文言和白话截然分开,对汉语词汇的研究是一条死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汉语词源学深入研究走出一条路的同时,我们开始本着古今沟通的方法来探讨汉语双音词产生的原因,并从意义上来挖掘语素结合的理据和作用的。卜师霞的论文《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正是这一阶段汉语双音构词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师霞在源于先秦文献的双音结构中,选择已经进入现代汉语

的本源双音合成词,将先秦书面语中词语的原初状态与现代汉语中词的成熟状态结合起来观察,为的是探讨文言成分在现代白话中的存留情况。师霞是一位重视师承、严格求真的学人,她放弃了将构词法与句法等同的模式建构方法,遵守训诂学提出的意义中心说,较熟练地运用训诂学改造过的义素分析法,采用了也细化了训诂学总结出的“语义结构模式”分析法,在耐心、细致地分析每一个所取范围内的词汇个体后,从两个层面归纳出汉语复合词语素凝结的动因——文言单音词的句法功能削减、黏着语素产生,是个体词语进入双音构词的直接原因;而单音词失去造句功能的根本原因,又是汉语词汇从孳生阶段到合成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新要素的产生和系统的层次化调整所导致的。正是这种个体变化数量的增多,引发了使文言系统向现代汉语系统的整体演化。这些结论,都对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深化起了推动的作用。在论证过程中,她扩大了视野,提出影响词义整体发展的三个内在的因素——认知心理、词汇系统、特殊的语用实践,这就使主要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这篇论文出版延迟了10年,在这10年里,我们关于以意义为中心的汉语词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探索:首先是为了证实词汇的系统性,利用专书语料的共时状态,对古代手工业、农业、法律、礼仪等专科词汇,做了多次系统描写,探讨了描写的方法,也对汉语词义关系的有序性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其次是探讨了汉语作为不带语法标志的词根语,它的意义内涵是怎样支撑了句法功能,又承担了如此大量深刻、丰富的言语作品。在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双音构词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一部分甚至是系统和意义内涵研究的前提。这就促使师霞的研究不停顿地向前推进。

当前的评估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几乎是无时无地不在催促发表论文的数量。高校的老师虽然也有少数的确到了学术爆发期,论著较多涌出;但也有不少在那种无端的催促中把握不住心性,制造了太多的急功近利论著。这种风气也影响了学生,一批更为无根的“文章”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师霞是有定力的。这10年,她以高度的责任感努力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也没有以博士论文为终点,在担任古代汉语基础课和词汇语义学选修课的教学中,对汉语特点和双音合成造词以及词汇语义的诸多问题,时有体会和新的创获。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她应当会把那些点滴的创获掇拾起来,形成更成熟、系统的认识,寻求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推进理论向前发展。

最后要说的是,师霞的探索,都是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基于对训诂学的继承而采取的,虽不一定成熟,但具有使训诂学走向现代的深远意义,这条路也是我们需要坚持的。只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也存在自己的局限,现代语言学的意义研究已经有了一批值得认真借鉴的成果,我们需要学习。师霞的这部书注意了这一点,但还做得很不够。只要从语言的事实出发,从语言的特殊性入手,不去套用和因袭,学习和借鉴是重要的,大家的研究应当可以殊途同归。

2018年10月25日 北师大

目 录

序	王 宁	1
绪 论		1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1
二、研究原则与研究目标		7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8
四、相关课题研究概况		16
五、研究材料的选取		23
第一章 先秦传承复合词的来源概况		34
第一节 先秦传承复合词的两种不同来源		34
第二节 先秦传承复合词来源的语法属性		39
第二章 先秦传承复合词意义变化分析		40
第一节 先秦传承复合词意义比较的原则和方法		40
第二节 先秦传承复合词意义变化方式		47
第三章 先秦传承复合词结构变化分析		79
第一节 先秦传承复合词意义结构变化分析		79
第二节 先秦传承复合词形式结构变化分析		98
第四章 先秦传承复合词词汇化动因分析		139
第一节 先秦传承复合词词汇化的系统动因		140

第二节	先秦传承复合词词汇化的个体动因	170
第五章	先秦传承复合词对现代汉语构词的影响	173
第一节	先秦书面语句法模式向现代汉语 词法模式的转移	174
第二节	先秦书面语单音词向现代汉语 构词语素的转移	183
结 语	209
参考文献	213
后 记	223

绪 论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汉语本源双音合成词的形成有两个渠道：“第一种是历代词语演变、转化、积淀到现代汉语层面上的，属于纵向传承的渠道”，“第二种是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合成的，属于当代补充的渠道”^①。前者为历史传承式，后者为现代合成式。本书的研究对象属于前者，指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我们称之为“先秦传承复合词”，并把这些词的原初结合状态称为“先秦传承复合词的来源”。为行文方便，书中有时会将“先秦传承复合词”和“先秦传承复合词的来源”简称为“传承复合词”和“传承复合词来源”。

本书以“先秦传承复合词”为研究对象，从词汇角度来讨论“文言”对“白话”的影响，主要基于汉语发展过程中长期“言文脱节”的事实。

文言与白话是相对的概念，从载体上说，两者均为书面语。

^①王宁《论本源双音合成词凝结的历史原因》，见《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一般认为,文言是先秦口语的书面化;白话则是唐宋以来口语的书面化。实际上,把文言作为先秦口语的书面化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明。如果从先秦所保留的典籍来看,除一些语录体的著作,其他的哲学、文学以及历史的经典一定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在语体上也应该具有书面语的色彩,只是这一时期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相对较近。白话也是如此,“白话文不等同于民俗口语,它仍是文人之所为,典范白话文的作者相当一部分也精通文言,易于吸收文言成分”^①。因此,如果立足于各自形成时期的语言系统,文言和白话在载体和语体上都是书面语;如果立足于唐宋以来的汉语词汇系统,白话的口语色彩远胜于文言。因此,语体差异在文言与白话的对比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汉语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言文脱节”的现象。所谓“言文脱节”是指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距离逐渐拉大,以至于在共时共域中却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词汇、语法系统。“言文脱节”并不是汉语的特性,但在汉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东汉开始一直到“五四”时期,口语不断发展,书面语却一直和先秦语言保持着很稳固的一致性。

“言文脱节”在汉语中的长久存在和中国社会以及汉语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首先,经典的权威性使书面语滞后于口语。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经典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它不仅是教育的范本,更是后来者修身、进仕以致治国的典范。这种经典传播的权威性使中国的学术重师承、重传统,后来者力求维护师说,圣贤之书不可动一字。因此,无论口语如何发展,记载经典的书面语则趋向于稳定。

^①王宁《当代理论训诂学与汉语双音合成词构词研究》,见《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09页。

其次,科举制度是导致“言文脱节”的重要原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①。因此,文言便“高踞其位,堂上一呼,堂下百诺,就形成相当协调的一统”^②。无论口语如何发展,文言仍旧是历代文人模仿学习的典范,既是他们阅读经典的工具,也是他们作文科考的必备能力。而科举的本质是选择官员,这就使文言成为上层社会的书面语交流工具,千年一统,亦步亦趋。

再次,从汉语自身来看,文字的特点也是“言文脱节”能够长久存在的内部因素。汉字是表意文字,不以标音为原则。汉字的表意性使它可以跨越语音的变化而直接和词义发生关联,具有超时代性,并“缩短两个时代的笔语的距离”^③。当我们认识一个字后,可以不必知道它古今字音的发展变化过程,却可能通过字形知道其所记载的语言单位的意义。汉字不随口语的语音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从某一方面为书面语的稳固提供了可能。

“言文脱节”导致汉语书面语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两大体系的分流和并存。分流使它们在词汇、语法上特点鲜明;并存又使它们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从总体上看,文言对白话的影响应该是更强烈的,尤其是在词汇方面。原因在于:首先,由于文言在科举制度中的特殊作用,使它在上层统治阶级和文人的文化生活中占绝对优势。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不同社会阶层在词汇的使用

①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第5页。

②张中行《文言津逮》,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③吕叔湘《文言与白话》,见《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9页。

上却是有差异的。因此,作为耳濡目染的书面语,它的词汇一定会影响到这部分人的口语,随着语感,他们把文言词汇自觉与不自觉地带进了历代口语。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决定他们的文化必然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其他角落。其次,文言作为文献语言,已经成了文化的载体,这使它在流传上形成优势,具有超方言性。

另外,由于文言一般被认为是先秦口语的书面化。从语言的历时发展来说,先秦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具有源流演变关系,这也决定了现代汉语必然从历时承袭了大量的文言成分。因此,可以说,文言是从两个途径进入现代汉语的:“一是按历时的顺序承袭;一是由于历代宫廷与文人的书面语模仿文言,他们自身较强的文言语感将文言中的先秦语言成分带入了历代的白话作品和口语之中,从而保留在现代汉语之中。”^①

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文言成分的存在是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现象。张中行先生指出:“两千年来,能写作的人表情达意,惯于用文言,这表达习惯的水流总不能不渗入当时通用的口语中,因而历代相传,到现代汉语,仍不能不掺杂相当数量的文言成分。”^②王宁师认为:“文言文超越时代的特点对现代汉语书面语词汇系统的形成有强大的牵制作用。”^③冯胜利指出:“当代书面语体是文白交融的产物”,“正式语体必须含有文言。文言白话仍然没有、

①来源于王宁师 2006 年 4 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座《谈文言与白话的关系》。

②张中行《文言和白话》,见《张中行作品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 页。

③来源于王宁师 2006 年 4 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座《谈文言与白话的关系》。

也不可能彻底分家”^①。这些论述应该说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客观认识。

从我们对现代汉语的观察,也能够看到这种关联的密切性。

首先,现代汉语中有一部分复合词是文言短语词汇化的结果。这些词的合成理据、词汇化语义机制、词义引申的轨迹以及感情色彩的形成,都和文言的本源密切相关。例如:“偏袒”原指“解衣袒露一臂”。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战国策·燕策》)

汉时,吕后死,太尉周勃入北军,传令军中说,助吕氏的右袒,助刘氏的左袒,军中将士都袒露左臂,于是周勃率兵尽杀吕党。后遂以双方相争、袒护一方为偏袒。了解了“偏袒”的源头才能解释后来的词义发展。

其次,现代汉语复合词中两个语素之间相互选择的原因,常和构词语素的古义特征有直接关系。例如:“权”“衡”在“衡量”义上是同义词,浑言可泛指“秤”,析言则“权”指“称锤”,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秤砣”或“砝码”。如:

立权度量。(《礼记·大传》)孔颖达疏:“权,谓称锤。”

谨权量。(《论语·尧曰》)朱熹集注:“权,称锤也。”

“衡”指起平衡作用的“秤杆”。如:

为之权衡以称之。(《庄子·胠篋》)成玄英疏:“权,称锤也。衡,称梁也,所以平物轻重也。”

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孔颖达疏:“权、衡一物。衡,平也;权,重也。称上谓之衡;称锤谓之权。”

^①冯胜利《论汉语书面语语法的形成与模式》,《汉语教学学刊》2005年第1辑,第20页。

由于“称锤”在衡量物体时是轻重的标志,因此“权”的词义引申后可组成“权势”“权力”“权柄”等复合词;而且由于“称锤”是随着物体的轻重而变化的,“权”又有了“权变”“权诈”之义。而“衡”主要是起平衡作用的,所以构成“均衡”“平衡”“抗衡”等复合词。可见,“权”“衡”构成复合词时的理据是由古义特征决定的。

此外,现代汉语复合词中还保留着大量从文言而来的构词语素。这些语素可以分成两部分:1.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失去独立活动的的能力,只在构词中存在;2.在现代汉语中虽可单用,但单用的义项和作为构词语素的义项有所不同,后者保留了上古的词义。例如:“救”的“制止、阻止”义在先秦文献中为常用义。如:

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

(《周礼·地官·司救》)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论语·八佾》)何晏集解引马融曰:“救,犹止也。”

此义在“救火”“救灾”中保留下来。

在现代汉语中一些语素意义的判断必须结合先秦意义。如:“企”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能单独使用,但还可以构成“企及”“企慕”“企盼”“企求”“企图”“企望”等双音词。在这些词中,“企”的意义和先秦时期的意义有密切关联。《说文》“企,举踵也”,即“翘起脚后跟”。“企”又作“跂”,《尔雅·释鸟》:“其踵举。”《释文》:“企,或作跂。”《荀子·劝学》:“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跂”是“望”的一种方式。《后汉书·陈蕃传》:“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企及”指“翘着脚才能够到”,“企”同样是“及”的方式。这种方式表达了“望”的急切和“及”的难度,这使“企”的词义发生泛化,带有某种程度性,表示后边被修饰语的程度之深。因此,“企及”表示的是“很难到达的”;“企望”表示“非常

希望”；“企盼”表示“急切的盼望”；“企求”表示“非常想得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企”的解释为“抬起脚后跟站着，今用为盼望的意思”，应该说是不确切的。

可见，文言词汇系统对现代汉语复合词词汇系统的影响渗透是广泛而深入的。这不仅是语言历史发展的共性决定，也是汉语发展的个性使然。因此，把现代汉语中的先秦传承复合词作为研究对象是从汉语实际出发的一种探索。

二、研究原则与研究目标

在研究中，我们立足于如下几点原则：

首先，以汉语书面语为背景来观察词汇的发展变化。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都不同于词汇史研究，词汇史侧重从文献和方言中寻找各个时期口语的真实记录，并对口语的演变作断代的推演与比较。我们则从汉语文献语言出发，比较传承复合词在古今书面语中的变化，并加以解释说明。

其次，对于现代汉语性质的界定采用吕叔湘先生的观点。吕先生以“白话”产生的晚唐五代作为历史分期，将汉语发展史分为古代和近代两大阶段，认为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①。吕先生的观点是基于汉语实际的思考，是从“文言”“白话”两大书面语体系出发作出的分析，这种两分观念尤其适用于汉语书面语词汇系统的划分。因为从汉语词汇系统性的变化来说，离开“文言”“白话”的区别，很难再找到典型的断代标准。由此，现代汉语书面语应属于

^①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第1页。

“白话”的一部分,是白话在发展中的逐渐定型和完善。

第三,从语言系统的内部特征看,把先秦汉语和文言作为基本同质的语言。因为文言从产生到退出过程中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大共时的书面语系统,尽管时间跨度很大,但基本上是以先秦汉语作为基准的。

在以上原则的指导下,本书的总体研究目标为:1. 试图通过对现代汉语中“先秦传承复合词”的研究,从词汇角度沟通汉语两大书面语体系——“文言”与“白话”,考察“文言”对现代汉语复合词的影响;2. 通过“先秦传承复合词”与其来源之间的比较,观察它们从“文言”传承到现代汉语过程中在词汇语义上的变化。

具体目标如下:1. 对比“先秦传承复合词”与其来源的词义变化情况;2. 在词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先秦传承复合词”意义结构与形式结构的变化;3. 探讨先秦传承复合词的成词动因;4. 分析先秦传承复合词对现代汉语构词的影响。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训诂学的语义观

“中国训诂学是植根于汉语的,以词汇意义为研究中心,以语义探求(考证)、贮存与解释为应用实践的传统学科。从训诂学里体现出来的语义观,是中国固有的语义观,也是符合汉语实际的语义观。”^①王宁师将这种语义观概括为三个方面:语义主体论、词

^①王宁《当代理论训诂学与汉语双音合成词构词研究》,见《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15页。